

0146740

G239.22
9J-34

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

——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

中国书籍出版社

重视出版史的研究

——为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写的序

王 益

汪家熔同志编完了他的出版史研究文集，把原稿复印了一份给我，希望我写一篇序，我欣然应命。我读过几篇他写的出版史研究文章，对他的研究水平有所了解。他长期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热心了解馆史、并进行研究，他的文章中必有商务历史情况的介绍，正是我所希望了解的。1949年我随军从山东农村进入上海，遇到商务老人如史久芸、戴孝侯、赵景源诸位先生，以及在商务工作的地下党员徐文蔚，上海解放即进入新华书店的张觉民等同志，我都要问这问那，不放弃向他们请教的机会。我对商务是一直抱着崇敬的心情，看作是我的学习对象的。为写序而读，正好一举两得。我花了几天时间，读完了他40万字文章的复印件。又发现他曾在1985年出版过一本《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向他借了来。这本书有15万字，花了一天多时间读完了。读后感到很得益。

建国以来，在和平环境中，比较地有了学习和研究的条件和时间。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和研究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我国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的号召，有了一定程度的落实，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空气浓厚起来了。出版界也不太落后，据方厚枢同志统计，从1946年至1995年，我国已出版出版史专著和资料书98部。这不能说不繁荣。但是，我们也看到，不重视学习和研究历史、认为读不读这些书无关宏旨的观点和现象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的。不重视这些书的出版发行，阅读的人很少，可以作为证明。创刊于1982年的我国唯一的一种出版史刊物《出版史料》，

出了 32 期后，因必须“节省开支”而并入《编辑学刊》成一隅之地，也是一个证明。

研究出版史的书刊不被重视，受到冷落，有外在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有些出版史的文章质量确实不高。对历史书的要求，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简单说是“以史为鉴”，多说几个字是：“总结过去，指导当前，教育后人”。这些话看来很平常，其实很不平常。既要有总结，又要对现实起指导作用，又要对后人教育意义，这很不简单。胡乔木同志对历史书的编撰，提出了“可读、可信、可取”三项要求，做到也很不容易。就可取这点讲，因为读的人水平有高低，目的有差异，同一本书，有的人认为可取，有的人可能觉得无“可取”。要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是非常不容易的。上述这些，可以看作是对出版史研究著作的总要求，但并不要求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都能做到。

可不可以这样设想，把有关出版史的书分为两类。一类是出版史研究著作，特别是以“出版史”命名的书，这类书常常会被看作教材。学习和研究出版史，首先会找这类书读。对这类书的要求应该高一些。编撰这类书，需要特别努力，特别慎重。一定要把总结、指导、教育、可读、可信、可取这些要求放在心头，使人读了以后，至少会感到有所得，有较大的收获。如果读了以后，不过是获得了一些知识，一些资料，而毫无启迪，那么忙于实际工作的同志对这样的书是不会有兴趣的。另一类，是史料。这一类是供研究工作用的，给研究工作提供素材。这些书或文章要强调史料的可靠性，能起“存史”的作用。写得好的，有指导作用、教育意义。日记、回忆录大概只能算史料书。写得好的回忆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而且往往感人至深，有很大的教育意义，非一般的史料书可比，又当别论。有些胡扯乱抄只能列入另册。

当前出版、发表的出版史著作、史料、论文中的，有很好的可称精品的。例如《张元济日记》就是其中的一种。1982 年春，从

事出版工作 40 多年的年的宋原放同志读了以后，感到“相见恨晚”，很有收获。他建议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都能一读。一部书或一篇文章能使人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我看可以称得上精品了。精品终究是少数，不可能很多。出版业可以提精品战略，但不可能要求多数书是精品。可以要求普遍提高出书质量，凡出版的书都能达到一定水平，其中一部分是精品。对出版史的出版，也可以这样要求。

汪家熔同志最早从事印刷，后来做发行工作，1953 年组织调动转入出版社，1990 年退休，是个老出版。退休前就热心商务馆史，他搜集、整理、辑集了《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张元济文诗》等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刚才提到的《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他第一篇出版史文章发表于 1980 年，18 年来笔耕不辍，一直钻研出版史，主要研究近现代出版史，他告诉我，他写的文章，发表的大约已超过 80 万字，收在这本集子中的，不过二分之一。汪家熔同志是位老出版史研究工作者，出版史研究的积极分子。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文章，哪几篇可以算作精品，这要大家来评说，我不敢妄断。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其中有许多篇是花了极大的功夫、搜集了丰富翔实的资料，才能写出来的力作。例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等篇，其中许多内容是《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等书中找不到而是对今天的出版工作很有借鉴意义的。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和重庆市新闻出版局牵头组织了班子编写《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由于掌握资料不足，至今未能完稿。近年来生活书店和新华书店都编写出版了店史或回忆录，加上汪家熔同志这篇《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比较系统地提供了资料，《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的出版，看来为时不远了。

4 王益：重视出版史研究

汪家熔同志研究出版史，有几个特点。首先而且主要的是勤奋，他腿勤、手勤、笔勤、脑勤。他的《二十四史的250年版本史》一文，比较了1784 - 1989年间出版、能找到的31种版本的二十四史，论断解放后中华书局不轻信最早、而使用各史最好的版本作底本，又由各史专家依各种版本校勘并出校记，汇历代研究成果于一炉，是最优秀的版本。说明了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优越性，从而否定了片面强调“书贵初刻”的佞宋出版家。他花了多年时间，终于在旧燕京大学藏书中找到了出版于1815 - 1823年、大开本4800余页的《马礼逊字典》，从而可以原原本本地介绍该书的内容、蓝本、印刷诸问题，原来流传的诸多不实之说得以澄清。他第二个特点是求真务实，不轻信人言，遇到值得怀疑的问题，敢于提出商榷，力求水落石出弄清事实。这在本书和他写的《张元济传》中有许多例子。而且文字流畅无学究气。第三，他的文章史料丰富，但不是简单地堆砌史料，常常有客观的分析。《旧时出版社成功诸因素》、《活字印刷在古代为何未占优势》，就是这类文章。他的分析是符合实际而不是主观臆测。这些都是史学工作者必备的品质，很宝贵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为汪家熔同志在出版史研究上已取得的丰硕成果感到高兴，我祝愿他的文集早日问世。

1998.1.21.

(原刊《编辑学刊》1998年第2期)

目 次

王益：重视出版史的研究——为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写的序	1
商务印书馆创业诸君	7
谢洪赉与商务创办人的关系	20
主权在我的中日合资	
—— 1903 年 ~ 1913 年商务印书馆的中日合资	21
商务印书馆日人投资时的日本股东	32
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	
——解放前史料辑录	37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考略	89
1931 年前商务印书馆的发行	118
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	131
抗战胜利后的商务印书馆	176
记《华音初阶》注释者谢洪赉先生	188
“参谋长”高梦旦	191
“鞠躬尽粹寻常事”	
——杜亚泉和商务印书馆与《文学初阶》	193
受命于危难之时的陈叔通	209
商务印书馆古籍出版工作概述	211
第一本规范化词典——《现代汉语词典》	217
关于孔子是否编辑的答问	220
二十四史 250 年版本史	241
鸟瞰马礼逊词典	
——兼论其蓝本之迷	269

6 目 次

墨海书馆时期	
——世俗书刊时期的开始	289
新出版、新出版第一人——王韬	296
徐寿和江南制造局译书	308
清末至建国初的英汉词典	314
一本字典兴起一个行业	329
旧时出版社成功诸因素	
——史料杂录	334
旧时书业批发折扣	370
史料所见：出版业生存维艰	380
周恩来与新中国的出版	387
活字印刷在古代为何未占优势	408
木活字字盘的排列法	419
试论马礼逊词典的活字	423
近代印刷史三题	443
出版史的分期标准	454
关于《嘉兴藏》	464
“直隶官书局”和湖南书局	469
最早介绍马克思恐非胡貽谷	478
《东方杂志》是否有南北方版	
——略论出版史研究方法	481
章太炎未必哀挽夏瑞芳	485
研究出版史个案必须见书	486
《张元济诗文》有误收	488
自身债务怎能抵偿自身资产损失	489
《绣像小说》编者诸问题仍须探索	495
为《绣像小说》给樽本照雄的信	506
后记	510

商务印书馆创业诸君

商务印书馆 1897 年创办时资本仅 3750 元，1932 年战争中被毁前资产共值 2000 万银元，35 年间增值 5333 倍，其间后加投资不足 300 万银元。1932 年被毁后没有新的投资，依靠结余和信用复业，出版活动更加活跃，新中国成立前它共出书 1.2 万种，其中 4500 种在建国后得以重印或被人翻印。无论从文化上或纯粹经营上，商务都是旧中国少数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它的成功有各种因素，其中之一是它的股东结构和人员结构有利于企业发展，它的早期更为关键。

商务印书馆已有近百年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可称为它的早期（1897—1913），也可称为夏瑞芳时期，这 17 年他担任经理。17 年又可分为初创、增资、中日合资 3 小段。

一 初创时的股东

一直说商务由夏瑞芳等 4 位工人创办，近年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里更说其中有宋庆龄的父亲宋查理：“他同一些投资者合伙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该书第 4 章）。西格雷夫还真说对了，但仅说对一半：宋查理真是商务印书馆的股东，只是在创业 10 年后他才投资。

商务印书馆的发起人是夏瑞芳、鲍咸恩 2 人，投资者是 7 人。1934 年 3 月 30 日创办人之一的高凤池（翰卿）讲：“大股东是一位天主教徒沈伯芬先生，共认 2 股，计洋 1000 元。”其他是鲍咸恩、鲍咸昌、徐桂生各 1 股各 500 元，高凤池、张桂华、郁厚坤各半股各 250 元。这个讲话仅记录在两个内部刊物上，不被人所知，1983 年郑逸梅在《书报话旧》里使用了这个讲话，还有朱蔚伯。但这时早有新材料发现。1980 年我们整理张元济的日记

（于1982年初海内外发行）在1917年4月19日记有：“余又言，前次谈及本馆最先创办人及粹翁（夏瑞芳，时已故世）应另得报酬，此实当办，并非戏言。因问共有几人。翰云：两鲍各500，郁500，夏500，另西人某500，后让与桂华，翰自己250。又沈伯曾1000云。”户数差1户，各户股数略有不同。同一人所讲，似早的，1917年讲的离发生时较近，记忆较真。所差徐桂生确是早期，但不一定是创业股东。“壬寅（1902）七月不戒于火，所有帐簿均已焚去”（董事会秘书顾晓舟在1904年红账上批语），高凤池毕生日记也已失去，只能以《张元济日记》所记为权威了。

沈伯曾、沈伯芬当是同一人。他是张桂华在电报学堂的同事，信天主教。他父亲在苏松太道道署当法文翻译。他是最大股东，却从未参加过股东会，也查不出委托谁出席股东会行使股权，也即从未干预过经营方针。这对懂业务的经理者是减少了牵肘。

夏瑞芳、高凤池等在以往一些人笔下似乎是梦想发财文化又低的工人。其实创办人的学历都不低于中学，在当时是很可以的，其中张桂华是上海高等电报学堂教师，高凤池是美华印书馆经理。高凤池对于出版事业、新闻事业和银行以及三者的经营方向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有极深刻的见解。夏瑞芳对于国人的盲目排外的害处洞若观火，故世前不久曾对孟森建议扭转舆论。鲍咸恩是位出色的编辑。他们原先大多在洋人手下讨饭吃，洋人对我国人的那种傲慢，稍有一些自尊心和爱国心的都难以忍受。他们是在这种心情之下结集的。虽是合股，夏瑞芳上自经理、下至出店，兼数职只领24元工资。“业务繁忙时，他也能卷起袖子，脱去长衫，在字架上工作的”（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业务稍有开展，高凤池、张桂华都放弃原有职位和高薪从事商务印书馆工作。毕竟是一分精神才能得到一分成就，商务创业有适合发展的社会条件，但人及其努力不可抹杀。

二 鲍牧师一家

商务创业 7 位除沈伯曾外，都是基督教长老会堂口的信徒。除了郁厚坤尚待查考外，都是长老会清心学堂学生；除了高凤池外，都是鲍牧师的子婿及姻亲，都兄弟相称。

章锡琛在《漫谈商务印书馆》（《文史资料选辑》第 43 辑）一文中说鲍氏兄弟从小丧父，因姐姐受洋牧师帮助从宁波到上海清心学堂，由学生至教员，遂全家迁上海，恩、昌得以在清心读书，云云。章说有误。庄俞：《鲍咸昌先生事略》：鲍咸昌“年十一，就学于清心堂，堂为基督教北美长老会所设，先生之父哲才公为创立者之一。”在《鲍咸昌先生哀挽录》里有鲍哲才与恩、昌、亨三子的合影，照片上恩、昌、亨均已成年。

鲍牧师名华甫，字哲才，浙江鄞县（宁波）人。清心堂牧师，有子、女各 3，都在清心读书。

长子鲍咸恩，毕业后在英文《捷报》馆（China Gazette）排字，“性格慎重谨细”。待人“温文尔雅”。创办商务后，“主任编译校对各事”（杜亚泉：《记鲍咸昌》）。商务印书馆人称他为大鲍。

次子鲍咸昌。21 岁毕业后进美华印书馆，先学雕刻铜版，后来当西文排字工人。商务人称他二鲍。他的夫人是郁厚坤的大姐（鲍正帆：《哀启》）。后来咸恩长子鲍庆林进商务，大家随庆林称郁厚坤、郁厚培为娘舅。自 1902 年商务分设三所后，他和咸恩主持印刷所。咸恩故世后直至 1928 年他任印刷所长。他对于印刷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十分热心。1920 年担任总经理直至 1930 年逝世。

行三为女长公子，名待查考。她和张桂华结婚。张桂华字蟾芬，出身贫苦；父亲是棉花店职员，早逝，时桂华 5 岁。张桂华 8 岁入清心，毕业后考入电报局，分到九江。临行前结婚，时 1899 年 5 月。5 年后夫妇同返上海，张在电报局高等学堂教电学和英

文（李恒春：《张蟾芬长老传》）。1909年商务拟经营西书，他辞高薪的电报学堂教习职，从事西书部的开办工作。后来一直担任签字处——核复开支工作。

行四为女次公子鲍钰，适夏瑞芳。夏青浦人。父亲原务农，后在上海董家渡营摊贩，母亲在美国人处当女佣。夏11岁进清心，20岁父去世，辍学入同仁医院当护士。因性格不合而转印刷，后在捷报馆当排字领班。

行五为幼女鲍懿，适郭秉文，因而郭和夏瑞芳为连襟。鲍懿去世较早，郭继娶夏瑞芳三女夏路德，连襟成翁婿矣。郭后来筹建东南大学，任校长。

行六为幼子咸亨，原在海关工作，和张桂华后进步商务，1910年8月主持保管股，负责契约、证券、重要文书的保管。称三鲍。

高凤池和他们是同学：“先生世居上海虹口，幼年生活很苦，父亲早死，由母亲陆氏抚养，11岁时进清心义塾求学。半工半读。21岁入美华印书馆，31岁升为经理，34岁和夏瑞芳等创办本馆”（商务印书馆《馆务通讯》第1期《高氏传略》）。他是在商务业务有所开展时被夏瑞芳动员辞掉美华书馆经理职进商务的。1916年任总经理，因为和经理张元济性格、宗旨不合，捍格5年，1920年经人调停同时辞职，同任监理。7年后辞监理职，专注于他的另一投资企业——五洲大药房。

清心学堂，后来按制改为清心中学，以前在上海县城大南门外桑园（见《上海指南》），附近是清心堂，即礼拜堂。两者都是美国北美长老会所办。1860年范约翰（J.M.W.Farnbam, 1830-1917）来华任学堂院长和圣书会秘书。次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教会进款减少，范约翰把学堂改为半工半读。工分园艺印刷两种（参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324页）。印刷主要印圣书会宗教宣传品，范约翰一个钱办了两件事。当时教会学校和后来废科举后的大不一样，所教科目不能应科举，入学者都是贫寒子弟工读所得文化、技艺能直接服务社会。这就是夏、高、大二鲍等清

心学生毕业后都和印刷有不解缘的因由。

当时教会学校宗教宣传是必修课，长期接受宣传后都成为信徒。礼拜等宗教活动使同学们毕业后仍能经常接触。夏瑞芳和鲍咸恩在英国人的捷报馆当领工和工人，经常受气。在礼拜时他们经常将所感到的痛苦告诉高凤池，想谋一出路。后来想到驾轻就熟，办印刷厂。高凤池已经是美华书馆经理，有管理经验，对他们的动议研究后认为可行。在筹备的时候，大鲍对夏瑞芳说：“你我所有的一点积蓄已尽数放在上面，拉入的亲戚朋友也是不少，如果失败下来，自己果然不了，又如何对人呢？”（《同舟》第2卷10期12页）。这种责任感也促他们经营的勤勉谨细。他们虽是合股，实同一家，装订折页都是女眷的义务工。暑假，他们的孩子都要上摇架做工（同上）。

当时上海大小印刷厂林立，商务以质量站住脚。杜亚泉说：“时张菊生（元济）、蔡鹤卿（元培）诸先生，及其他维新同志，皆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而海上各印刷业皆滥恶相沿，无可与谋者，于是咸踵于商务印书馆，扩大其事业”（《记鲍咸昌先生》）。

夏瑞芳是位有冒险精神的人。商务开业不久，他将稳妥而利薄单一的印刷转向兼营能获厚利但有风险的出版。他转入出版非常稳扎稳打，根本不是有些人笔下描写财迷心窍莽撞受骗的“形象”。他经常向委托他们印书的人请教，印的是种什么性质的书，适销于那种人。合适的，他就搭印一部分，这部分成本就极低。再就是请懂业务的人编译英语课本、词典，如谢洪赉和颜惠庆。这些具有开创性成份的书销路极佳。颜惠庆后来讲，他增订的《华英字典》（1898年商务出）“学界钦崇，几于人置一函”（《英华大辞典序》）。夏瑞芳想出用有光纸印《通鉴辑览》等常销书，售价仅及木版书十分之一二，销路很畅。唯一有风险的是1989年冬他们买稿出版了40万字的《马氏文通》。当时读者热衷阅读政法史地等翻译著作，而《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语法书，

是近代第一部融会中西学术的专著，又属开创性学科，读者是否会请教？这部书出版后受到社会重视，4年后，1902年，汉语语法被政府承认，《钦定学堂章程》中规定为学生必修课。可见不能不承认夏瑞芳既有胆，更有识，又谨慎从事。

在出版略有眉目之时，又聘用“老书坊里杰出人才”俞志贤、吕子泉、沈知方，开设沧海山房从事发行。至迟在1901年初，除上海自行设所外，在杭州、湖州、武昌、烟台、扬州、安庆、九江、南京、重庆、宁波、镇江、苏州、天津、北京、广州、香港、新加坡、横滨等18个城市组织有代销处，使出版有较厚实的发行基础。

当时上海流行组织译书机构，作出版后盾。夏瑞芳有意于此，曾问讯于金粟斋译书处的包天笑。包天笑对他有所建议，这就要扩充资本和请人（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236-237页）。高凤池说：“夏先生想扩充本馆，预备设立编译所，想聘请张先生主持编译事务”（《同舟》第2卷10期9页）。

三 第一次增资

张先生即张元济，进士，刑部贵州司主事，调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戊戌变法上书言事，政变时受革职永不叙用处分，到上海南洋公学任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因为委托商务印书，和夏瑞芳“常有接洽，见夏鲍诸君办事异常认真”（同上）。南洋公学译书原译兵书，张去后改译政法等“时务书”（参见《严复集》第3册第527页“一问”及南洋译书院书目）。1901年初兼任公学总理（相当校长），但时时受监院（相当教务长）美国人福开森牵肘，难以施展，想自己办出版（参见同上第540页），“以匡时弊”。夏瑞芳问包天笑，自然也会向张元济请教有关编译事。“双方意见相投，一谈之后张先生等愿意投资参加。同时印锡璋先生亦有意参加”（《同舟》第2卷10期9页）。

印有模，字锡璋，嘉定人。父亲名印子华，1861年经理海盐

人陈理耕开设的日盛布摊，后来发展成大型零批店。印子华故世后，成日新盛布店。印有模和周辛伯（后来也是商务股东，担任过董事）都担任过日新盛经理（参看《上海市棉布商业》1979年版第34-35页）。印有模还是上海闸北的纱厂老板。19世纪，上海的批发布店都经营洋布，和欧美洋行交易。马关条约后，日资、日货大规模进入我国，印有模经营日本布，和日本人有往来。印和夏瑞芳也有往来。1900年商务以低价盘进日商在上海的修文书馆印刷器械就是印有模从中撮合。

这次增资完成于1901年夏天，原有资本3750元，4年半中没有分过股息、红利，估值升值7倍为26250元，张印两位投资23750元，共为5万元。这次增资，张元济为实现社会目的投资，使夏瑞芳组织编辑部扩大出书业务的希望得到了人才和资本的保障。印有模投资，促使了不久的中日合资。

印有模和三井洋行上海支店长山本条太郎有很深的个人经济合作关系：1902年2万锭子的上海兴泰纱厂倒闭，合资收购者以上海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名义在香港注册，董事4人为山本条太郎、霍拉西奥·罗伯特、印有模、吴麟书。1906年盛宣怀的大纯纱厂出盘，新主人将之改名三泰纺织品公司。“三泰”者，新主人有三位：山本条太郎、苏葆森、印有模（参阅樽本照雄：《商务印书馆与山本条太郎》，《清末小说》第2辑）。正是印有模和山本的这种关系，促使了商务的中日合资就不奇怪了。

在第一次增资至1903年10月中日合资前夕这2年多时间里，新版书籍主要是从日文翻译的社会科学和文学、历史读物。这些读物流传的时间并不长。唯一流传时间长的是夏曾佑的著作稿《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四 中日合资

1903年农历十月初一日中日合资，股本计20万元。日方投资10万元。中方原有资产仍按1901年第一次增资时5万元不变，

再增5万。中日合资有说是和金港堂合资。这样说不正确，是和金港堂大股东原亮三郎为中心的日本人合资。

原亮三郎（1848 - 1918），姓原，日本岐阜县人。25岁（1872）外出闯练，1875年在横滨开设金港堂，规模很小，翻印、发卖文部省编小学课本。次年移至东京，逐渐出版一些教育参考书，并注意建立代销点，至80年代中已稍有名声。1884年接受建议，聘请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三宅米吉赴美考察，归国后以三宅为中心组织编辑部，聘请教育界知名人士从事中小学课本编辑。又旁及社会科学、文学、哲学。成为明治4大教科书出版社中所占份额最多者。1892年改为股份公司。1900年辞社长职，由其长子亮一郎负责（参阅樽本照雄：《清末小说闲谈》，法律书社，第319 - 353页）。1902年12月17日日本国教科书贿赂、受贿案爆发，涉及金港堂等20余家出版社和152人受审讯。案件结束后，为安置受牵连，原亮三郎决定在上海投资。他委托他的女婿，即山本条太郎调查、计划。山本与印有模的关系已如前述，自然会和印有模商量，或者继上海纺织公司之后再次合作。

当时我国的印刷技术还很落后，而国外又进步很快。商务当时仅能铅印，铜锌版都不会做；在出版方面还只是初获成就。日本人招请一个华经理，或和其他出版社、印刷厂合作，商务就多一个强大对手。如果和商务合作，就足以壮大商务。这是商务当时的想法。商务以往的成绩也会吸引山本的意向。

10万元日资已知不少于3位投资者：原亮三郎、山本条太郎、加藤驹二。

山本条太郎（1867 - 1936），是三井洋行上海支店长。他1881年进三井当学徒，1888年到我国，先后在东北、上海，1897年升任三井上海副店长，负责棉布推销。甲午战争时他为侵华日军在华采购粮秣，可看作升任副店长的原因。这个人后来成为东北南满铁路公司总裁（1927年起）、三井财团的重要人物、政友会巨头之一。这是后话。

加藤驹二是金港堂的总务部长，相当于我国出版社的总编室主任，教科书贿赂案中有他。合资后在商务工作，1908年春他为商务编译所（相当于出版社）组织了专司和印刷所、发行所交涉，并研究各书销售情况的出版部，。

和原亮三郎、加藤同时来华的还有小谷重。合资后作为日籍雇员在商务编译所工作。他原是金港堂“正7位”编辑主任，也是教科书案中人。他在我国呆的时间不太长。

长尾槇太郎（1864 - 1942）。长尾柏四郎的长子。他的名、字、号极多，从小跟柏四郎学汉学，1888年东京帝大文科大学古典讲习科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后又在东京美术学校、第五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授。后来在文部省专门学务局兼职，期间接受集英堂300元赠款，教科书案中受轻判。他是一位接受儒家思想的学者，判虽轻，但名誉和心理上的打击极深。1904年1月来商务后直到1914年1月收回日股后才回日本，并一直处于隐居状态，直到逝世。小谷和长尾对商务合资后的《最新教科书》有一定贡献，但其贡献决非日本学者相信的长尾自述那么大。长尾是“从六位”教授，比小谷的职称高，在《最新教科书》封面上长尾在前。

1905年农历2月商务两次增资，前一次老股有增资权，后一次还供有关人员，包括得力职员。前一次日本方面有：原亮一郎、山口俊太郎、利见合名会社、筱崎都香佐、益田太郎、益田夕夕、藤濑政次郎、铃木岛吉、神崎正助、丹羽义次、伊地知虎彦。后一次，日籍职员除长尾外，还有田边辉雄、小平元、木本胜太郎、原田民治。两共19位日本人成为新股东。

原田民治和金港堂并无关系。他早在戊戌前就来我国，受罗振玉及其朋友所办的东文学社、农学会及两会社所办《农学报》、《教育世界》杂志之请从事日语教学和翻译。王国维的日语就是跟他学的。他大致在1905 - 1906年左右进商务。

小平元负责买纸，深受中方器重，日资退出后他继续供职，后

来自己经营才离商务。

中日合资后董事各2位：印有模、夏瑞芳、原亮三郎、加藤驹二。1907年为中3日2：夏瑞芳、张元济、印有模、原亮一郎、山本条太郎。1908年为中2日1：夏瑞芳、印有模、原亮一郎。1909年后全部由中方担任。

中日合资后出版物的重大变化是停止了翻译日文政法、社科史地等“新学”著作，以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兼及翻译小说。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01年夏清廷实行“新政”，第二、三年相继发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各地纷纷举办学校，对新式教科书有广泛需要。1902年请杜亚泉编蒙学读本《文学初阶》共6册，次年《钦定学堂章程》公布，规定蒙学为5年，需课本10册。1903年5月商务请蒋维乔独力编撰语文课本10册。10月初稿将成时，商务已和日本人合资，改由集体编撰，小谷、长尾均有所指导。加以插图、印刷装订远比当时其他书局精美，从此打开销路，逐渐占领市场优势。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林纾翻译《茶花女》、《黑奴吁天录》，为中国读者开一新眼界，此后林译改由商务出版，翻译小说逐渐流行。自从1909年秋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新政”进入高潮，加以科举已经废止，适应法官、文官资格考试需要，政法业务书籍走俏，商务对此极花力量。至辛亥，它的出版物结构顺序：1、教科书，2、政法书，3、地图，4、杂志，5、小说，6、簿册，7、排印古籍。

1902年商务建立编译所，人数不多。中日合资后陆续增加，至辛亥约有六七十人。他们中对这一时期出版活动有重要贡献的有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庄俞、寿孝天（于教科书）、邝富灼、伍光建（于英语书）、孟森、杨廷栋（于政法书）、夏曾佑（于文学、历史书）等。

高梦旦（1870 - 1936），福建人，戊戌前就醉心新学，撰有《废除跪拜论》、《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等。他不以科举作进身阶，以教读自给。1901年任浙江求是大学堂总教习，次年率